

【书 评】

如何开始用比较的视角去思考 苏联的族群问题¹

唐纳德·霍洛维茨 (Donald L. Horowitz) 著 袁剑 译

一段时期以来，密切关注苏联问题的研究者参与了这样的一种争论，即，苏联社会是否会像在独立与分治时期的印巴、比夫拉 (Biafra)² 战争时期的尼日利亚、塞浦路斯、黎巴嫩、北爱尔兰、斯里兰卡甚至南斯拉夫那样严重分裂。有些耸人听闻的预言一度声称，苏联无法在其严重的族群 (ethnic) 差异面前仍然屹立不倒。

我在这篇文章中的目标很小：只不过想用比较的视角帮助勾勒出苏联在处理族群问题方面的经验。我将相应完成三件事情：(1) 从最近几十年世界范围内族群冲突的复苏中，说明苏联在族群冲突方面的经验；(2) 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下，开始对苏联独特的族群关系加以举例说明，以便更容易地进行分析；以及 (3) 对苏联内部的族群现象以及更为宏观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可能联系做一些论述。³

要反映苏联族群性 (ethnicity) 的重要性，有必要恢复一种世界性的族群观念，但这种观念上的复苏并不局限在世界的某一区域或某种政治体系中。尽管不同的政治体系在处理族群问题时的方法各异，但是，不管是在民主体制还是独裁体制之下，这些问题都会存在。在亚洲与非洲，像印度和斯里兰卡这样的民主国家，它们的族群问题同那些独裁体制国家一样严重。东欧早就是一个族群关系紧张的地区，而如今，正如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当前出现的困境那样，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在西欧与北美地区，尽管通常认为已经“形成了”族群的多元共荣，但也不得不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面对族群意识的复苏浪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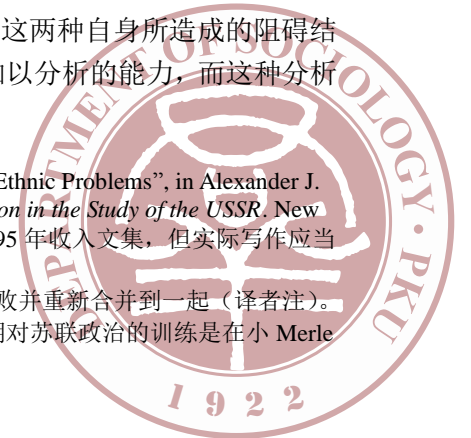
在探究族群观念 (sentiment) 起源的过程中，认清其双重特征非常重要。族群性意味着冲突与暴力，但同时也意味着亲缘关系与共同体意识。人们对族群表现出的忠诚度反映了他们某些相当基本的需求。在快速转型时期，当人们离开通常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家族而独处异乡时，族群纽带就成为建立人际间信任与情感的基础之一。当政治体制发生变革，或者变得令人不敢亲近时，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族群纽带就能够提供一种保证，即，领导者能够保障群体成员的利益，并使之依附于政治组织，而这种依附本来只能通过政治组织的那种颇受质疑的合法性才能实现。

我们理解苏联族群状况的能力受到两种先入之见的阻碍，这两种先入之见大多是在西方学术界形成的。首先，在众多的社会科学学科中，长期将**苏联研究**从比较研究的主流中孤立开来。其次，西方学术的总体趋势就是把社会阶级 (social classes) 看作是比族类 (包括种族的、国家的、宗教的以及语言的) 群体更强大、更自然且更容易理解的冲突根源。这两种自身所造成的阻碍结合在一起，就妨碍了我们将苏联的发展放到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内加以分析的能力，而这种分析框架原本可以使我们对苏联的发展状况做出更为清楚的解释。

¹ Donald L. Horowitz, 1995, "How to Begin Thinking Comparatively About Soviet Ethnic Problems", in Alexander J.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History and Comparison in the Study of the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9-22. 本文正式发表在 1992 年，1995 年收入文集，但实际写作应当在 1991 年苏联解体之前。

² 尼日利亚东南部一地区，1967 年宣布从尼日利亚独立，1970 年被尼日利亚击败并重新合并到一起 (译者注)。

³ 尽管我不是一位苏联问题专家，但或许我还是应该承认自己在研究生阶段早期对苏联政治的训练是在小 Merle Fainsod 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



苏联研究的这种孤立状态是在我们用同一种范式（paradigm）来理解苏联（尤其是二战之后的苏联）时所产生的意外结果。在对苏联社会进行了数十年幼稚且经常自吹自擂的评论之后，人们方才开始认真地对苏联体制加以描述与分析。由于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相关术语几乎无法解释苏联政治问题，因此，要实现这一任务，就必须发展出新的模式。那些受过俄语训练、精通俄国历史与文化、并且由于通常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实地研究，而只能从出版物中窥探苏联政局微妙变化来解释苏联发展的专家们，开始建立起一种与研究西欧或美国的学者们不一样的知识体系。

使**苏联研究**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当然是必要的，它使没有多少创见的历史学在缺乏足够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还是试图去理解苏联的问题，但这意味着，除了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少量研究之外，人们缺乏对苏联问题的一以贯之的具有比较视角的研究方法。正如我之后将要提及的那样，当像族群冲突这样的问题在苏联出现时，可以在其他国家相同现象的比较中更好地加以理解，但是**苏联问题专家们**很少会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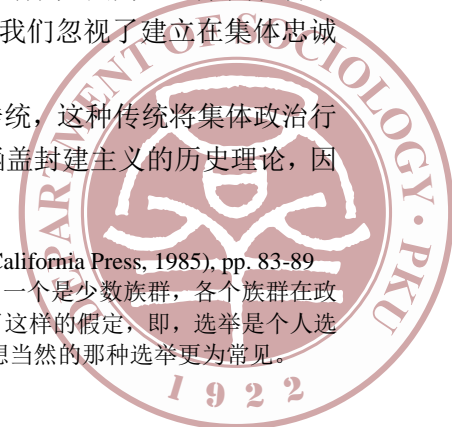
我要指出的是，之所以要采用社会底层的术语来看待冲突的趋势，并以此对作为冲突根源的族群性（ethnicity）的频度及重要性作出评价，其中的原因各不相同。正是这种巨大的趋势使我们忘却了西方近代史中的一些中心观点，比如 19 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等，它还使我们忽略了族群成员的功能。我认为，从功能的角度来说，之前所提到的诸如成员身份满足，其中就包括了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企盼，以及彼此密切协助的需求，而其他的组织在提供这类协助时，要么动机可疑，要么完全跟个人无关。族群性可能被看成是跟家庭本身一样的家庭附属物；确实，族群（ethnic group）是家庭的一种大为拓展了的形式。因此，族群性是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尽管族群被他者所定义，并且也有其自定义，但相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族群方面都是混杂的，而其中的一些还会进一步分化，这不足为奇。但为什么所有这些都忽略、遗忘或抛弃了呢？

轻视族群问题的第一个原因，在于西方对先赋属性（birth affiliation）的深深偏见，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它要回溯到反封建主义的时期。封建社会的社会分层是先赋的，也就是说，社会地位是在出生之后就继承得到的，要摆脱这种地位通常是不可能的。随着欧洲从封建主义中挣脱出来，封建身份的桎梏被打破了。封建主义的一大贡献就是固化的、与生俱来的社会身份特征。改变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社会身份的转变，则是现代性的一种标志。毫无疑问的是，此后，现代社会就会设法压制先赋属性，而族群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以先赋属性为基础的。

忽视族群问题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自由化的个人主义更强调了族群联系的重要性。在这里，并不是因为这些联系的先赋性特征被低估了，而在于忽略了群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凝聚作用的能力。自从霍布斯以来，人们就将个人看成是社会决策的组成部分。霍布斯与洛克所谓的社会契约指的是组成社会的个人之间的协议。自由民主制的正式政治组织建立在个人行动者平等共存这一不证自明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些行动者的偏好积聚起来，进而作出权威性的决断。作为西方民主制基石的选举就是这样的一种机制，即，单个人的投票被追加到一起以达成最终结果。当然，在这种机制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对每位公民个人来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明确观念。但是，这种个人主义的假说往往无法预测到特定社会集团尤其是族群的政治行为，因为这些集团轻易就能对西方民主制的政治组织造成巨大破坏。¹自由主义的个人偏见使我们忽视了建立在集体忠诚原则之上的行为。族群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集体忠诚为基础的。

当然，与西方观念下的个人偏见根本不同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将集体政治行动看成是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也许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一种涵盖封建主义的历史理论，因

¹ 在我的著作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83-89 中，我给出了一国有两个主要族群的例子，这两个族群中，一个是多数族群，一个是少数族群，各个族群在政治上有着内聚力，因此，多数族群会选举出一个永久统治的政府，从而否决了这样的假定，即，选举是个人选择从而能够实现执政权更迭的机制。实际上，我所叙述的这类选举较之我们想当然的那种选举更为常见。



此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在传承关系方面的观念并不对立。但是，马克思主义只将社会阶级视作是可以成为政治主角的与生俱来的集团。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传统低估了个人社会流动以及社会阶级之外的传承性集团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社会阶级是封闭性的冲突集团，他还认为，其他有一定界限的冲突集团都是次要的。如今，我们知道，他在这两个方面的判断都不准确。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在众多社会中不仅可能，而且经常发生，正是这种流动性消除了作为一种继承性的、封闭的冲突集团的社会阶级的意识。同样地，族群也确实是由那些具有继承关系的人们所组成的。因此，族群冲突恰好就包含了众多的封闭性集团，而马克思当初曾认为，社会阶级会扮演这一角色。

尽管马克思犯了错误，但他的思想还是影响到了西方对社会冲突的看法。直到今天，就算是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者也经常会用社会一阶级的术语去看待冲突问题，并探寻各种冲突背后的物质利益。这就成为对族群性的政治驱动力认识不足的第三种原因。唯物论者的偏见使我们将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生计问题”。它忽略了一些族群政治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威望、尊严、集团价值以及共同纽带与地域问题联系起来，而这些问题无法被归结为物质上的问题。当发生族群冲突时，唯物论者倾向于将其看成是一种突发性情况、一种表象之下的更深层的经济冲突的表现。毫无疑问，这样的观念就是一种系统性地贬低族群性并误解族群冲突的看法，哪怕他们已经意识到将会爆发族群冲突。

作为西方观念与历史倾向（即忽视族群问题）的最终结果，它使得我们在亚洲及非洲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以印度 1947 年的分治为开端）时期开始出现并随后拓展到其他各大洲及世界范围内的族群冲突浪潮面前束手无策。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将族群及种族关系看作是不值得深究的事情，认为应该逐渐调整观念以应对其他汹涌而来的大问题。因此面对这些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族群争斗，西方与非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们完全手足无措，当他们作出反应时，也毫无头绪地将对族群问题的深刻理论思考、具体行动上的压制与缓和矛盾的措施混杂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在族群冲突爆发之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着手编印了一系列评估报告和出版物，设法用科学的方式消除“种族歧视”。这些出版物的宗旨认为，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些人种内在的与生俱来的身体或智力或性格上的差异，并无可验证的生理基础，基于这些不同差异的区分是非理性的。要解决族群或种族问题，就必须消除个人层面上的偏见，简而言之，就是去修复那些接受了错误信息及错误观念的人的心智。¹建立在群体差异观念之上的行为，应通过教育来加以消除。

事实上，这种意愿良好的努力可能根本无法预先阻止族群冲突。一方面，个人的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变过来。至少在某些国家，关注歧视行为当然要比对待歧视思想更容易些。在另一方面，诸多的族群冲突并不仅仅局限于“歧视”，而已经成了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特征。除此之外，人们对缓和族群冲突的技术的强调，也降低了对心灵及观念方面的关注。因为从心灵与观念的角度来看，缓和族群冲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彻底消除冲突，而是对之加以限制并疏导，以消减其破坏力量。长期以来，学者们并没有对这些方面加以关注，政策制定者们也没有对此进行研究。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们无法理解苏联内部的族群冲突。甚至在当像比利时和加拿大这样的西方国家或者亚非国家的族群问题专家们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族群冲突方面时，苏联问题专家还是晚了一步，并在使用比较性文献方面步履蹒跚。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但总的来说，只是到了最近，才一步步赶上来，开始真正严肃地、并且用比较视角去研究苏联的族群问题。²

¹ 我要感谢 Ivan Hannaford 使我能够利用他的著作中对这些发展所作的更具说服力的概要。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物的一件例本，参见 Juan Comas, *Racial Myths* (Paris: UNESCO, 1958); L. C. Dunn, *Race and Biology* (Paris: UNESCO, 1958)。

² 在诸多重要成果中，Rasma Karklins,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USSR* (Boston: Allen & Unwin, 1986) 一书试图将问题纳入比较性的族群关系研究，采取的主要社会学研究方法；Alexander J. Motyl, *Will the Non-Russians Rebel?*



在社会学中，对族群关系的研究尽管早已是老生常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冲突还是日渐频繁，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奥斯曼帝国及哈布斯堡帝国的衰亡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开启了族群意识的洪流。二战之后西欧帝国的衰落也同样在新独立国家中引发了族群意识，并随后在欧洲与北美引起共鸣。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及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所作的承诺也同样开启了东欧的族群意识，而这些族群意识是公开反对苏联控制的。如今，在苏联内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采取了同样的举措，因此，我们认为族群紧张局势不会在短期内得到缓解。

到目前为止，对专家来说，在族群关系方面，这些问题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例如，在族群混杂的地区，诸如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州）以及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这些地方希望摆脱外来统治而自立。在经济上的发达地区，存在着一种对当地收支平衡加以重新调整的强烈意愿。我认为，这些情况都很类似，而如果将苏联内部族群冲突的特殊情况与其他地区的情况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收获更多。

我要说明的是，为何我认为这种比较是必需的，以及为何这些比较研究对于理解苏联的族群问题将大有帮助。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解释类似的冲突问题，而且还在于，这种比较研究能够更好地探究苏联存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族群冲突，而之前认为苏联各地的族群问题有着相同的不满、争端及解决方式的想法，现在看来无疑是错误的。

要将国家的情况与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结合起来考虑。人们可能会先验地认为，具有较高人均收入的国家将会怀有要求完全独立的强烈愿望。在1940年苏德协定签订后被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确实是这种情况，并且它们也确实选择了独立。然而，我想，从比较视角来看，也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为何经济上发达的地区通常也许会对其他的一些条件心满意足，而不会选择彻底独立。

这种情况值得加以探讨。某一地区有着高于当地人均收入的族群通常会有一种经济上的不满情绪：他们相信，较之投到当地的资金，中央政府从该地抽走了更多的税收。西班牙的巴斯克及加泰隆尼亚地区就是绝好的例证，较之从中央政府获得的收益，这两个地区都要上交更多的税收。这些地区也接受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他们在这些繁荣地区寻找就业机会。陌生人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人口平衡上的摩擦与担忧。独立可以使“本地”居民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他们能够因此而截留税收，并控制（或排斥）外族人。这是一种诱人的前景。然而，在对这些地区的现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后，我们经常会发现，在那些工业化地区的繁荣景象之下，存在着众多的隐性补贴，从而使得真正的成本收益率无从知晓。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些补贴会用来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在制造品方面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地区可能正从关税保护中受益，因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能并不具有竞争力。这在巴斯克地区是千真万确的，而在解释为何巴斯克人更愿意选择自治而非独立方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此外，还需要考虑到，人们经常会报道教育水平较高的族群的相关情况，这是因为，这些人通常会离开其家园以寻找就业机会。从经济落后地区来的发达族群（尼日利亚的伊博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较之那些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发达族群表现得更为引人注目，这是因为落后地区通常无法为其所有的居民提供现金支持。但是同样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位于发达地区的发达族群的人员在寻找更能发挥才智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背井离乡的大量族群成员的存在对这些地方的脱离及独立来说，就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

我并不认为任何其他的族群都刚好会契合这种判断。例如，尽管爱沙尼亚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State, Ethnic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USS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一书所关注的是稳定性与组织化的问题，并因此对整体性的抗议及政治发展进行了研究；而 Gail W. Lapidus 的一些论文，其中包括“Ethno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Soviet Case”，*World Politics* (July 1984), 36 (4): 355-80，将苏联的现象与比较族群政治文献结合到一起加以研究。



度上建立在矿产的开采之上，这些矿产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卖上好价钱，但其他地方确实不大可能再出现类似的情况。¹以采掘性工业及典型的出口贸易为经济基础的发达地区会发现它们的生产并未得到补贴，反而被中央征取税收。试图免除这些税收、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卖并截留收入的意愿，鼓励了分离主义的发展。此外，波罗的海各族通常不大愿意离开他们所在的共和国而到苏联的其他地方找工作。²这种不情愿态度，就使某些特有的不利因素转变为分离主义。因此，能约束巴斯克人那样的族群的因素却无法约束爱沙尼亚人或其他波罗的海各族人。当然，波罗的海国家曾经的举动也使苏联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提供补偿性的激励。

然而，我还是认为，对苏联国内各地区性聚居的族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趋于分离主义以及他们将接受怎样的结果，这些都值得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涉及族群及地区利益的群体的反感态度及诉求问题进行更为广泛的研究。³换句话说，必须采取一种换位分析方法。由于我对于某些苏联共和国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因此我认为，如果进行严格估测的话，当地应该会存在对分离主义观念的一些重要的遏制因素。

中亚族群的情况使我一下子意识到，从长远来看，不同地区的族群关系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其可能的结果也大相径庭。通常，在中亚城市中，俄罗斯人占大多数，他们分隔居住，而且处于支配地位。在哈萨克斯坦，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人口迁入（in-migration）⁴，哈萨克人在整个共和国内部事实上是一个少数族群，在 1979 年的人口普查中只占总人口的 36%。哈萨克人是农耕民众，而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他们的忠诚是局限在地方层面上的。就像在一些亚洲和非洲的族群情况一样，他们的族群意识集中到整个**哈萨克**这一层面是相当晚近的现象。同样，大量外族陌生人的迁入强化了群体间的差异并增强了当地人共同的族群意识。包括哈萨克人在内的大多数中亚族群的族际通婚率低于 10%，这种比率在严重分化的社会中是很典型的。⁵所有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俄罗斯人成为与现代世界相关的技术的拥有者，“落后”但却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和“先进”的迁居于此的俄罗斯人共居一处。在这种共存情况出现的地方，所谓的落后的本土族群通常会强烈要求在领土内获得优先权，并最终要求实现整个社会的均质化（homogenization）。这种要求通常会经由族群间的暴力而得到强化，而分离主义者的活动也日益常见。与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问题相比，哈萨克斯坦在 1986 年及其之后的暴力活动实际上并不严重。

这些地区的族群对利益得失的估算使情况变得更为扑朔迷离，而较之位于先进地区的先进族群，位于落后地区（诸如中亚）的落后族群通常对分离主义更少顾虑，而更鼓励正式退盟（secede）。当然，中央政府会对他们提供补贴，这使得退出联盟的举动变得不那么诱人。在另一方面，在一个剥离出来的退出联盟的国家中，地方精英们将不必再面对来自接受更好教育的外来移民的竞争，在领导层对待分离主义的态度方面，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退出联盟的举动看起来会使某一落后地区在经济方面受损，但却似乎会使那些来自落后地区的“落后”族群的精英们受益，因为他们不会再受到竞争。**撵走外来移民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很常见。甚至那些在退出联盟之后设法留下来的外来移民也会被看成是无能者，而当地对外来移民实行这种歧视政策的人却不会像在未退出联盟时那样受到惩罚。

¹ 同样是从事捕鱼和旅游业，如果莫斯科不从中拿走一大块利润的话，其收入当然会高很多。我要感谢与 Rein Taagepera 教授所进行的关于爱沙尼亚的一次受益良多的讨论，但所有的结论都是我自己提出的。

² 这一点是 Alexander Motyl 提醒我注意的，我要感谢他对我提出的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

³ 这种框架在我的文章“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April 1981), 23 (2): 65-95）中出现并作了详细的论述。

⁴ 关于一些有趣的事例，参见 Geoffrey Wheeler, *Racial Problems in Soviet Muslim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8。

⁵ 参见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pp. 61-62。



哈萨克人要求俄罗斯人滚回家的宣言¹因此就被纳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比较图景之内。假如伊斯兰势力在阿富汗掌握权力，并且将其理念成功地越过北疆播散出去的话，对苏联当局来说麻烦会更大。而跟哈萨克的多族群共存地位大同小异的情况，在其他的、通常更为贫穷的中亚共和国中也同样存在。

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的是，冲突的爆发并不是无法避免的。不管是突发的还是有预谋的，统治集团都应该采取措施去缓和严重的族群冲突。要作出可靠的预测，就必须首先对族群政策的巨大影响以及自然状态下的群体感受进行非常仔细的评判。研究苏联政治的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在将中亚和其他非俄罗斯人的共和国（尤其是乌克兰）结合为苏联的过程中，存在着微妙的推动力。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中亚的族群共存现象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严重族群冲突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而中亚的情况与爱沙尼亚的情况在结构上有不同之处，需要加以逐个分析。²总的说来，比较性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将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异同之处勾画出来。

缓解族群冲突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领土进行划分和再划分。作为手段，联邦主义与地方自治能够疏导族群内部或族群之间的冲突，弱化某些差异，并强化其他的差异。尽管各共和国的权力非常有限，但至少在某程度上，苏联还是一个联邦国家。它相当成功地控制住了族群冲突，直到最近才有所失控，其中部分可能应该归因于其联邦特征，因为共和国大多是以族群组织起来的。³在其他地方，联邦内部属于同一族群的国家经常会强化族群内部的紧张关系，比如，各次级群体为了控制国家而进行争斗。当然，印度联邦（the Indian union）内的国家是按照族群语言加以归类的。在另一方面，像阿萨姆人（Assam）一样，为控制国家而进行的争斗大多是在族群世系间进行的，而且族群冲突很激烈。苏维埃联盟（the Soviet federation）的基本组织是对族群因素的一种回应，对领土的划分与再划分仍然是一种可以用来为族群政策服务的工具。

这并不是说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缺乏大幅度缓和苏联联邦制度内冲突的潜力，但是，这种民主集中制确实也导致了族群冲突。在很多方面，加盟共和国是些空架子，实质性规定都由莫斯科作出。但是这些共和国过去是、现在也依然具有一整套官僚结构，在这些官僚结构中，族群精英们能够在苏联框架之内施展才能，并且为苏联长期忠诚地服务着。已经在进行中的对苏联联邦制度的重新议定及完善，将会由于这些结构的存在而变得容易一些。

共产党的组织则是另一种能够缓和冲突的机构，但此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获取政治权力经常是族群的一大目标。在苏联，权力是由共产党所掌控的，而俄罗斯人和其他斯拉夫人已经在党的中央机构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他们在各共和国中也占据着过多的权力。随着中亚人变得日渐流动，就可能会使政党的舞台成为施展其抱负的首要目标之一。我们理应回忆起 1986 年哈萨克斯坦骤然而至的暴力事件，其导火索就是由于哈萨克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被一位俄罗斯人所取代。从整体性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当位于边缘地区的族群在政治上变得活跃时，在与族群分化的社会中的分离主义相对抗的过程中，分权化较之中央的严格控制能提供更好的保障，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中央当局也同样会经常认为事情有可能朝着对立面发展。一旦出现控制上的分权化，就会在族群关系的重大危机方面出现典型的反弹，经常会导致内战，而到了这个时候，再要想达到预期目标，通常就为时已晚了。苏联在期望通过政党实现族群权力分享之前，也许就已经遇到过诸多非常困难的抉择。各个共和国在此之前就遇到过族群问题，而且常常处理得更好，因此我怀疑苏联将不大会采取这种族群分权化的统治方式。⁴

苏联国内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如今已让位给了政党竞争。正像苏联国内多党体制的发展一样，众多的族群也会在政治上出现分化，甚至有的已经建立起各自以族群为基础的政党。一种以族群

¹ Karklins,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USSR*, P. 52.

² 关于进一步的阐述，尤其可以参见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p. 192 中的图表 2。

³ 关于联邦形式的演变，参见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17-22.

⁴ 参见 "Electoral Systems for a Divided Society" 这一章，收录于 Donald L. Horowitz,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in a Divided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163-203.



为基础的政党体系，是严重分裂的社会的最常见特征。在族群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之后，他们的宣言与要求变得彼此不相符。为了确保自身的发展，每个这样的政党都必须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否则就可能将代表性丧失给身旁更为极端的族群政党。而这种以族群为基础的政党体制很容易引发冲突。在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中，这些政党不大可能消亡。这种情况使得这些政党不大容易联合起来，但不管怎样，联合的努力总会促进族群内部的和解与协调。选举体制也远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力的政策手段，而只是最符合宪法的政策安排，这其中也包括了苏维埃的政策安排。做出这些安排时，人们应当已经隐隐地了解到了其减弱冲突的潜力。

我们在制定与族群无关的目标的时候，无视相关政策对族群所产生的影响，而只是去考虑怎样消除冲突或实现和解，这是不可能的。经济重建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在过去，苏联设置了许多建立在“领土”基础之上的经济单位，这种安排对族群关系产生了影响。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建立105个地区经济委员会（sovnrkhozy）而放松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的集权控制。在这些地区经济委员会当中，有一些的边界与共和国的边界相重合，但大多数共和国被划分成至少几个委员会的地域。这种改革假如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但地区经济委员会并没有）的话，可能会对族群冲突产生重大的影响。假如这些单位在功能上潜在地像联邦体制下的新国家或次级国家的话，那么它们就可能会将斗争的焦点转移到对下层区域的控制权上，其他类似的族群冲突也有这种变化。因此，就值得对比夫拉战争前、冲突时期、4单位联邦的尼日利亚直到比夫拉战争后的更为复杂的19以及如今的21个单位联邦的尼日利亚进行比较。我在这里并不想对各种改革结构的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因为这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研究，但应该强调的是，任何可能转变权力中心或权力平衡的改革，都会对苏联国内的族群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自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改革之后，改革将会日益深化，我们应该尽早对可能出现的族群后果加以研究。

正如我在第一部分中论及在理解族群冲突所遇到的困难时所指出的，尽管这可能是先入之见，但假如没有明确证据直截了当地加以反驳的话，我还是准备对苏联内部的现象作一整体概括。当然，这还有待商榷：

1. 在现代世界中，族群关系是一种持久的冲突要素。分裂与冲突可能会发生转变，但由于族群性能够提供像家庭般的维系与功能的需求，就意味着族群性将不会“凋谢”。然而，族群冲突并不是固化不变的，而是时刻变动着的；如今，这种冲突变得更多，也更为温和，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其中的一些受到了政策的操控，而其他一些却没有。

2. 毫无疑问，苏联无法消除导致族群冲突的动力。在苏联，阶级斗争并没有取代族群或民族的（national）斗争，而且也没有这种发展趋向。相反，族群性拥有一些强有力的、由冲突所造成的特征。而这些特征，马克思曾错误地将之归到社会阶级的头上。

3. 苏联并没有面对最严重和持续性的族群冲突。在一些地区，可能是人们制造出了这种冲突，这需要对族群类别、各自利益以及政策的影响进行细致研究，以对类似的后果有更确切的看法。

4. 苏联存在着诸多不同类型的族群冲突，而远不是仅仅一种。通过对苏联国界之外的相关问题的比较分析，对这些族群冲突的研究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5. 不同的政策，或多或少，都会强化或减弱族群冲突。这再次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在影响到族群冲突的各种政策中，有些并没有族群上的目的，其中包括诸如行政上的分权化、经济的重建以及选举民主制的方式等。由于苏联在当前正处于重要的政策转型期，因此，政策转变实际上很可能已经对苏联内部的族群关系产生了未曾预期的影响。

（译者：袁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博士）

中国社会学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李健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